

長汀文史資料

楊成武

第十九輯

长汀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录

进入大不列颠王国的大门(续)···李 欣(1)	
厦大旧址行——回忆厦大在长汀时的生活片断	
····· 廖 钺(11)	
抗日战争时期厦大对长汀中学的支持和影响	
····· 梁信彬(18)	
长汀师范的复办与腾飞····· 蔡荣宗(23)	
长汀县农机技术教育发展概况····· 吴淮南(36)	
长汀县中区小学简史····· 张湛培(40)	
长汀县博物馆发展简史····· 罗雅萍(4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汀苏区金融	
····· 赖 钧(53)	
略谈中央苏区以烈士名字命名的九个县	
····· 王其森(62)	
长汀染织业史话····· 毛 星(66)	
今日长汀的侨务····· 上官开源(83)	
长汀县市(圩)场管理概况····· 赖 鸾(95)	
虎口余生记····· 陈 飘(113)	
诗人康小园纪传····· 康 群(117)	

进入不列颠王国的大门(续)

——回忆在驻英代办处的一段经历

李 欣

有些友好人士我们就去家访。一次到一位科学家的家里去访问。进得客厅，只见四壁挂的都是“国画”。我没想到人们对中国画会这样喜欢。我曾作了个比较：西洋画重写实，特点是逼真，它可以将碧波表面的光亮，蛤蜊外壳的色泽全都再现出来；中国画重写意，让观众自己去充分发挥想象。这位主人用了Fantastic 这个字来形容中国画的不可言状之妙。这位科学家向我说，据他所知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几的科技期刊资料都是英文字的，你们要发展科技为何重点学俄文呢？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中国有句古话叫“折冲樽俎”，看来中外都一样，外事活动和饮食之间，关系密切。当前廉政建设，刹吃喝风是重要内容。我从事外交工作，始于社会主义国家，终于资本主义国家。深感在用公款请吃喝方面，后者较前者俭约。这并非社会制度问

题，而是具体制度问题。据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交际费用归大使承包，花过了你大使自己负责，我遇到有位访华回来的英国朋友，他向我吹嘘在中国如何一顿饭吃了一百多道菜。对这种说法我不无保留，但浪费是可以肯定的。对我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次外交部的中国科长请我去英国保守党俱乐部吃饭，主人直截了当地说：“你代表无产阶级，今天我请你到资产阶级的俱乐部来吃顿饭”。当然，那顿饭吃得很简单。我敢肯定他是用的公款，可他并没有大手大脚慷公家之慨。顺便，我问了他一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样研究我们中国的？”他说：“我每天把着一份《人民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我曾几次去外交部，主管中国及邻近几个小国的一位处长的办公室挺小，而礼宾正副司长竟是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桌子是面对面摆着的。英国工党一位议员请我到下院餐厅吃烤鸭，也只是一块鸭腿。我认为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在我任职那段期间（1954—1957）中英关系发展平平，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政治纠葛，经济贸易却有很大发展，伦敦四十八家集团的组成，对中英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英国人对外国使馆的活动范围，采取的限制措

施是以伦敦的大理石拱门广场为圆心，半径三十公里的圆周范围内，可自由活动。逾此则需于二十四小时前照会外交部（包括目的地和所取路线）。

我们设在馆外的一座宿舍楼，有天晚上当我人员留在使馆开会之际，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其中一人手持利刃逐屋搜查，当时有个看小孩的褓姆留在宿舍目睹这一切，事后我到外交部提出了口头抗议。

外交部找我们谈问题只有一次。那时台湾海峡一度呈现紧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投原子弹，一位政务次官助理约宦乡谈话，我陪往。谈话内容旨在劝说我克制。他说，好比在你前进路上遇上一个强盗，你不让就可能吃亏。宦乡说：“中国人一向不信邪，原子弹本就是纸老虎，从来没吓倒过我们。”这可能是美国人借他之口放风。在军事上往往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外交上又何尝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元首伊丽沙白二世的生日就是英国国庆。之前，我们接到外交部邀请出席的照会，规定：凡出席应邀男宾一律穿燕尾服。我们复照：“人民装（他们称为‘毛式服装’）”就是我们的礼服，我们将着“人民装出席”。对方于是又复照说：“如你们不感特殊，悉听尊便”。后

来我在宴会上看见齐赫文参赞，他一手托着高筒灰毡帽，一手伸过来拍拍我说：“瞧！你们的礼服多好，看我这身！”原来他穿的是燕尾服。我四下里望望，几乎所有亚非国家外交官都穿民族服装，反映了挣脱了殖民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国家一种普遍心态。

国庆那天，红地毯直铺到白金汉宫大门外。进得宫来第一眼看到的是门厅里那对一人来高的中国大瓷瓶。通往宫内两边走廊的红色壁毡上悬挂着长长一列中国彩绘大瓷盘。

人们来到宴会厅，按国别的第个字母，顺序依次站定。音乐声起，只见从东头那扇门里出来几个高帽戎装的武士，继之而来的是首相和各部大臣，然后是老太后、女王的丈夫和御妹马加利公主，最后才是头带镶满珠宝钻石的王冠，斜披一条红彩带拖着长裙迤迤而来的女王。她边走边同各国使节一一握手致意。当来到我国使节前，特意多问了几句话。依例，回话的第一句称“陛下”，以后只称“夫人”。会见结束后自由活动，自取食品，铜管乐响彻大厅，洋溢着节日气氛。晚清大诗人黄遵宪（当时清廷驻英公使馆参赞）有两句描写维多利亚女王温莎宫朝会的诗：“万灯悬耀夜光珠，绣缕黄金匝地铺”，盛况差近。客人何时离去自便，门口

有服务台，通知车号会立即通过扩音器把车叫来。故虽人数众多，但组织得井井有条。

每年夏季女王还要在王宫后园接见一次外宾和本国高级官员和知名臣民。园内设有三个大帐篷，女王所在者居中，左为外宾，右为内宾。帐篷内备有饮料和点心，自行取用。要觐见者自便。女王鹄立帐外，觐见者鱼贯而前，或握手，或吻其手背。莅场女宾多穿戴最漂亮的衣饰，堪称一次国际时装博览。

我参加的另一次大型宴会要数接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那次了。那是苏联最高领导的第一次访问英国。人们把他们比作“火星上的来客”，其隆重程度可想而知了。客人不知请了多少，不说绝后，也是空前的了。主客被堵在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一次都很费劲。出来之后也是人如潮涌，我踮起脚跟，好不容易才得一睹背项。

赫、布访英前，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当时的水电部部长马林科夫已先来英访问，访问结束，苏使馆为社会主义国家使节安排了一次会见，并有苏联著名大提琴师献演节目。马伫立门厅迎候客人。我作为临时代办应邀赴会。人到齐后，马向大家谈了他这次访英的观感。最后朝着我说了一句：

“据我所知，美国人对你们国家的巨大市场非常感兴趣。”

赫、布访英后，又有原苏联外交部长谢比洛夫来访。他们的频频访问，与赫鲁晓夫的改革不无关系。齐赫文就对我说过，论外交莫洛托夫远不如周恩来，莫僵化而周则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苏共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了二十大，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当然也包括他的外交政策。

1953年，为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我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演出团，先到巴黎，后到伦敦。中国演出团的来英，是中英建交以来最轰动的一件大事。

演出团由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带队，成员有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叶盛兰，歌唱家刘淑芳等数十人。演出节目有京剧、歌唱、民乐、舞蹈、杂技等。

英国人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接待这样一个大规模、高规格的中国艺术团。票很快销售一空，还卖出了不少站票。演出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演出过程中和演出结束后，伦敦各大小报纸连日都作了详尽的报导，并发表了许多精湛的评论。《雁荡山》的武功、《三岔口》的机智、《霸王别姬》的剑舞，

曾使英国人瞠目结舌，耳目一新。他们怀疑，荷花舞演员们的足下是否装有滚轮？那小个子的女歌唱家刘淑芳为什么能发出那样洪亮的嗓音？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伊丽莎白女王后悔没有前来观看。根据合同，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已届结束，但错过了这次机会咋成？时不可失，赶紧找了个理由，敦请中国艺术团多留一天，再为某项慈善事业的劝募义演一场，女王还要为支持这项劝募亲自到场呢！艺术团答应了下来。那天晚上剧场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一晚上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女王上台亲自赠花答谢，亲切慰问，这一场景，构成了这次艺术团演出的最高潮。演员们在英国也好像觅到了知音。他们说，观众中的掌声每每是在他们演出最吃力的地方爆发的，他们钦佩英国观众对中国艺术的欣赏水平。

英本土当时有华侨约四千人，以伦敦、利物浦两地居多，大都从事餐馆业和洗衣业。留学生为数不多。流动人员多为在轮船上工作的海员，广东人最多，其次为福建、浙江，也有少数的山东人。代办处成立后，他们纷纷前来换取新中国的护照。

卫生部长李德全，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1955年应英国红十字会的邀请到英国来访问。她是

已故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海外侨胞所熟知。我们借她的来访，特邀集伦敦的华侨到新修复的中国大使馆和她会见。

李德全部长以热情洋溢的演讲，介绍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给了侨胞极大的鼓舞。讲毕，她挥动双臂，指挥大家一起唱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著名歌曲。自那以后，每逢国庆都要为旅英侨胞举办招待会，他们扶老携幼，也有带上洋女婿的纷纷前来参加，并深以为荣。

渐渐地，不仅英伦三岛，就连远在太平洋里的斐济岛，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加勒比海的特里尼达等处侨胞都来信和代办处取得联系，有的反映当地侨胞情况，有的提出要捐资办学。大英帝国曾号称“日不没国”，可以这样讲，哪儿有过英国的殖民地，哪儿就有华侨。

一批批海员到代办处来申诉他们在海外受到的种种窝囊气和一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倾听他们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有位无事的海员叫张胜，在英属殖民地亚丁被当地法院以杀人罪判了死刑，他身陷囹圄，只能依靠他的同伴们到领事部来喊冤呼救。经查明案情后，代办处出了几千英镑的重金，延请了一位英国著名律师为他上诉，最后取得胜诉，撤销了原判，张胜恢复了

人身自由，得以重见天日，这件事在侨胞中，特别在海员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当家作主和新中国的强大力量。为表达他们这种心情，特制作了一面锦旗献给了代办处。

我们还帮助留英学生成立了中国留学生会，大陆去的苏选禄同学被选为会长。他们非常爱国，和代办处联系密切。

在英国的华侨中有位著名的红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吴世昌先生，他是位赤忱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代办处成立之前便经常以“读者投书”的方式给英国一些著名报刊投稿，澄清人们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代办处成立后，他常从牛津赶来，向我们反映情况并提过很多有益的建议。我曾借参观牛津大学之机到吴教授家里看望他的夫人严伯升女士和他的两个孩子，他们住在一座楼房的最顶层，一抬头就看见房架，人们常以为西方如何器重知识分子，生活如何优裕，事情未必都是这样。他的两个女儿那时还在上大学，我问吴教授她们毕业后怎么办。吴教授说：“回国。我看还是自己的祖国好。”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和著作，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器重。

有一位造船专家黄天佑先生，一天他来到代办

处找到我说，他幼年时期看到外国轮船装走了许多中国矿藏很痛心，决心学习造船，现在中国已能自造万吨大轮，愿将余生报效祖国，我们接受了他的请求，回国后安排在上海船舶研究所当顾问。

中国人往往有种自卑感，在英国友好人士中有位李约瑟博士告诉我说，你们国家远不止人们所常说的“四大发明”，我要写一部巨著叫《中国科技史》来阐述中国人对世界科技发展的伟大贡献。这书现在国内已有译本了，协助他做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埋头苦干鲜为人知的鲁桂珍女士。

还有一位廖鸿英女士，是福建长汀同乡，她是牛津大学的化学硕士，嫁给了一位英国外交官班以安先生。他们夫妇毕生致力于英中友好事业。李约瑟是英中了解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就是班以安先生。

当我代办处在伦敦开设时，撤离的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馆参赞陈尧圣先生有报导说前些年也曾回祖国来观光，这正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完）

厦大旧址行

——回忆厦门大学在长汀时的生活片断——

廖 钺

侨领陈嘉庚先生1921年6月在东南沿海之滨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创办了厦门大学。那是闽南文化教育上的一所最高学府，也是一所“华侨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那年十一月为避免战火的浩劫迁校长汀。我本是1939年就读广东文理学院文史系的，只读了一学年，第二年暑假便和潘炯华（原广东华南师范大学校长）、马海松两位同学跑去桂林参加全国统考，录取于厦门大学经济系。从此我就成了厦大的学生。

抗日战争年代，一个青年学生总是怀着“读书和救国”两重强烈的心愿而走上学习道路的。当时我只有二十岁，只身从粤北韶关经南雄、龙南、赣州、于都、瑞金到闽西长汀去。虽然走的是一个后

方安全地带，但交通落后，社会乱纷纷和人情风土不同等等，要闯这样的道途确实要付出相当大的勇气。

长汀是典型的山城。它的古老年代却是闽西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期间，东南沿海一些厂商和金融事业机构前后迁来长汀，这时候长汀又成了一个经济和人口集中的大后方，繁荣景象极盛一时。这个自古以来的闽西山区著名的州府是显得繁荣热闹了。我的母校正是在这个时候（1937年11月）迁到长汀。那时福建这所最高学府选择这一迁校地的决定是很明智的。一来这个山区是个十分偏僻安全的地方；二来这座古城是素有名望的；三来它紧邻广东、江西，内陆交通总算便当，对吸收外省学生入学也是有利的。

学校设在北山（另名卧龙山）麓孔庙、万寿宫一带。迁来时，学校仅有文、理、法商三院九系，学生297人。到1941年，扩为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四个系，学生增至634人，教职工141人。1945年，全校学生858人，教师和科研人员108人。这个州的几个古建筑物的是相当宏大的，包括它的附属建筑物足可容下学校的课堂、图书馆、学生宿舍。有一部分教师住在右侧新建的简易的、当年还算“阔气”的新式小洋房里。我记得黄开禄、李

庆云等教授就住在那里。有的老师则寄住在城里老百姓家。在流亡的年代，学校是简陋的，师生的生活是简朴的，师生的要求是简单的。在这样一个“简”字下面，尽管抗战硝烟弥漫，但我们的学校依然是弦歌不辍。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深深认识到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艰苦创办厦门大学“坚毅诚笃”精神和学校的优良校风。如此校风，又是和萨本栋校长的教学、办校精神分不开的。当年山城的大学倒集中了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博学鸿儒的人物。外文系主任为周辨明教授，中文系主任为余骞教授，数学系主任为方德植教授，生物系主任为陈子英教授，还有知名的教授谢玉铭、傅鹰、朱家炘、黄开禄、肖贞昌、童国瑞、施蛰存、洪琛、林庚、冯定璋、李笠、卢嘉锡、郑翹宗等。

我读的经济系，经济学原理是黄开禄系主任亲自任课的，英语课是李庆云教授任教。李教授是一位澳洲华人，中国话都不会讲，用英语教学。一些英语基础不好的同学上他的课，既爱又怕。那时同学们读好一年级课程，确实要艰苦磨练才过得了关。李教授虽然满口洋腔洋调，可是他总爱穿着长衫便服，一派唐人学者模样，他的身上也许正是一种中西结合吧。美国博士黄开禄教授倒是另外一个模式，他是西装毕挺，典型的洋派学者。他是中青年

学者，他向同学介绍的参考书全是美国学者的著作。当年人们有说厦大教学是美国式的，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那是位高个子周辨明教授，他也是西装革履的洋派模样，对学生总是笑面相迎。他既主持教务又兼基础课，还正在编写他的《英汉字典》。他孜孜于学问的海洋中，恒兀兀以穷年。这种重教重学精神是很令人钦敬的。厦大的师生有的在这里当年的中学小学担任了一些课程，这也对山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学校还出版一些学术和文艺刊物，组织过一些抗日宣传的演出队、歌咏队和话剧……这些新文化的活动，特别对宣传抗日起了良好的影响，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我的母校对长汀的一个贡献吧。

厦大的教授、专家、学者来到这个古老的山城里，虽然他们的道德学问对当年闭塞的闽西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作用，但他们的行为风度，倒对山城原有气质既有不协调又有互相吸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也往往表现出古调和洋腔，新与旧互相混合、互相协奏地混合前进，使山城增添了新色。特别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几百名莘莘学子涌进这个古城来求学，更是给山城开风气之先。

长汀对这些新来客人的日用所需的供应，尽可能地给予满足，厦大搬迁长汀，所带来的新文化的